

◎ 新清华文丛 ◎

唐宋诗学论集

● 谢思炜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唐宋诗学论集

谢思炜 著

商务印书馆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学论集/谢思炜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新清华文丛)

ISBN 7-100-03635-6

I. 唐… II. 谢…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②古典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9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新 清 华 文 丛
唐 宋 诗 学 论 集
谢 思 炜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中 科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7-100-03635-6/I·15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2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论自传诗人杜甫·····	1
——兼论中国和西方的自传诗传统	
杜诗的伦理内涵与现代阐释·····	18
杜诗叙事艺术探微·····	34
杜诗的自我审视与表现·····	52
净众、保唐禅与杜甫晚年的禅宗信仰·····	69
杜诗解释史概述·····	79
《宋本杜工部集》注文考辨·····	98
 初盛唐的政治变革与文学繁荣·····	114
唐代通俗诗研究的若干问题·····	134
李白与盛唐山水诗·····	155
——《蜀道难》再解读	
从张王乐府诗体看元白的“新乐府”概念·····	170
 宋祁与宋代文学发展·····	183
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	200
吕本中诗歌创作简论·····	217
南北宋之际的政治学术分野与诗学分派·····	234

2 唐宋诗学论集

梦窗情词考索	252
——兼论本事考索及情词发展历史	
传奇的衰落与词的兴起	269
禅宗的审美意义及其历史内涵	293
乐之歧解	310
——从苏轼到袁宏道	
后记	329

论自传诗人杜甫

——兼论中国和西方的自传诗传统

在中西诗歌比较研究中,人们往往在语言层面或心理层面上指出中国诗歌在抒情性、意象性、对自然和世界的感受、格调、神韵等等方面的优越之处,说明中西诗歌的差异。然而,仅仅立足于这些层面的比较研究,其实受到了西方诗学思想视界的某种限制。作为西方现代派诗歌发轫的意象派诗人,曾直接从中国诗歌的文字形式中获得灵感,其后二十世纪的诸种西方诗学思想一般也更注重语言形式、意象分析等等。因而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性等特点对西方评论家一直保持着特殊的魅力,而它的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内容和远不够完善的叙事手段,却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大多数评论者,甚至包括有意涉足中西诗歌比较研究的中国评论者,尽管批评了庞德(Pound)等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文字的误解和拘狭的理解,但因囿于排除社会历史因素的语言形式层面或仅能用某种难以捉摸的民族性格加以解释的“心理世界”层面的研究,仍未能真正跳出意象派和西方现代派诗学思想的窠臼。当然,这些流派或学派的研究成果是需要吸取的,但我们还应尝试从其他层面、其他角度更全面地认识中西诗歌的特色及异同,尤其不能忽略从形式与内容互相关联的角度,从社会历史因素不但影响于诗歌内容而且亦影响于诗歌形式的角度,来探讨这一课题。本文

想要说明的是,与西方诗歌比较,中国(文人)诗歌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特征,不在于它的意象性、神韵、格调等等,而是它进入社会、进入历史的一种特殊方式,即自传方式。自传性是中国文人诗歌创作乃至除小说、戏剧之外的其他文体创作的一个首要特征。而有“诗圣”之称的中国诗人杜甫则是这种方式的代表,他是最典型的自传诗人,同时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诗人,因而我们需要探讨他作为自传诗人的意义,并以他为代表探讨中国自传诗发展的一般特征;同时在可能范围内与西方也曾出现的自传诗人进行比较,尝试说明双方的同异和各自的价值。

一、杜甫之前中国自传诗的发展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诗体分类上,自传诗属于抒情诗,而不属于叙事诗。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自传诗的起源都与抒情诗体相关联,在西方,甚至直接源自一个重要的抒情诗派——浪漫主义诗派。这个诗派产生于抒情诗发达的近代,而不是叙事诗为主的古代和中世纪。其中最重要的自传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惠特曼(Whitman),都是抒情诗人,而不是叙事诗人。但是,自传诗又必然包含了叙事,甚至是以叙(自我之)事为主。自传诗的本质特色正在于它是抒情与叙事融合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这一点上,显露出它内含的矛盾性格和它的特殊优越之处。

在中国,文人抒情诗的发达,也正是自传诗体早熟和自传诗人众多的原因。这一发展传统,可以追溯至中国第一位文人诗人——屈原。在屈原那里,诗歌已经直接与诗人个人经历密切联系在一起。他的主要作品《离骚》、《九章》中都包含了对自己身世、经

历的叙述,而且这些作品便直接产生于他的个人经历中的痛苦遭遇,包含了他的外在社会活动和内在精神活动的描述和记录,甚至达到了后人都难以企及的丰富性和完整程度。因此可以说,屈原的诗歌已经包含了很强的自传性,只是其中的叙事线索还不很连贯,叙事因素相对薄弱,真实经历分散淹没于一些幻想和神话情节中,还不能称为严格的自传诗。然而,在屈原为中国文人诗歌预示的发展方向中,与个人经历紧密结合的自传性显然已成为最突出的特点。

整个汉代,由于文人抒情诗本身的衰落和停滞,诗中的自传因素自然没有任何发展,甚至难以找出一篇像样的带有自传性的诗歌。然而,在东汉末年建安时期,随着文人诗创作的空前繁荣,自传诗体也获得了很大发展。在女作家蔡琰笔下产生了一首相当完整的自传体诗——《悲愤诗》,这首诗标志了中国自传诗体的成熟。蔡琰的作品转变为对个人经历如实的、构成完整阶段(从陷匈奴到返汉再嫁)的叙述,同时也继承了屈原诗歌的强烈抒情因素,在篇幅上也超过了此前除屈原之外的所有文人抒情诗。这首诗是中国、大概也是世界上第一首当之无愧的自传诗。其他建安诗人也大多通过诗歌抒发身世之感,从诗中窥见了他们的个人经历。其中如曹操的《苦寒行》、《善哉行》,王粲的《七哀诗》,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等,都包含有相当程度的自传成分,只是在表现个人经历的时间跨度和完整程度上逊于蔡琰的《悲愤诗》。

建安以后,随着文人诗歌创作数量的增加,总的来说,诗歌与诗人个人经历结合得愈来愈紧密,诗人愈来愈有意识地借助诗歌抒发自己人生遭际的感触,通过诗歌可以愈来愈多、愈来愈清楚地

窥到诗人灵魂发展的历史乃至实际生活的历史,因而诗歌中的自传性是逐渐增强的。最重要的诗人如嵇康、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庾信等人,其作品都包含较强的自传性。而像嵇康的《幽愤诗》、陆机的《与弟清河云诗》(《赠弟士龙》)、陆云的《答兄平原诗》、庾信的《和张侍中述怀诗》、孙万寿的《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杨素的《赠薛播州诗》等,都是具有相当规模、可以上拟蔡琰《悲愤诗》的自传体诗。

通观这些自传体诗或自传成分较强的作品,可以发现它们一般篇幅较长(包括组诗形式),时间跨度大,构成完整的并且是主要的诗人生活阶段,包括了比单纯的咏物、写景、言情、叙事体诗更为复杂的成分。因而很明显,只有当抒情诗的各种因素和手法乃至抒情诗体之外的其他一些诗体都发展到相当程度后,自传诗才可能出现;而一个诗人只有具备相当熟练的写作技巧之后,也才可能尝试自传诗的写作。这些作品又大多以“悲愤”、“幽愤”、“咏怀”、“述怀”等名篇,几乎无一例外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巨大震荡和诗人生活的重大变化之中,并显然包含了诗人悲愤、幽恨、明志、自誓等强烈思想动因在内,可见自传体诗还要求诗人主观上必须具备足够的生活阅历,具有深刻而不是浮泛的人生体验,并且具有士阶层优秀分子特有的强烈自觉的诗人主体意识。因而,民间作者、宫廷侍从作者及偶一为之的作者,都没有也不可能创作自传体诗。此外,自传诗人还必须具有足够的创作数量,如像蔡琰那样仅有少量作品流传,则必须有相当长的篇幅,足以反映他们的一生。因而,真正能称得上自传诗人的作者在杜甫之前或之后都只能是一些第一流的诗人。但另一方面,中国文人诗人的创作道路又使自传性成为他们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这种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便自

然产生出成熟的自传诗体和自传诗人。就大多数诗人的创作而言,自传性的表现只有强弱程度的区别。没有与诗人经历结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抒情诗、山水诗、叙事诗等等,在中国文人诗歌中始终不能形成完整自足的传统。

在这样回顾自传诗的发展时,还应忽略自传因素在赋这一具有诗性的文学体裁中的发展。自传体赋亦来源于与体物大赋相对峙的抒情小赋,或者说,它即是东汉时期兴起的抒情赋的一种重要形式。可以举出的作品,有班彪的《北征赋》、班固的《幽通赋》、班昭的《东征赋》、张衡的《归田赋》等。这些作品具有与上述自传体诗近似的内容特点,篇幅则大大超过诗体。由于赋本来长于铺叙言事,抒情赋也多保留一种叙事框架,所以它可以容纳更多的自传的叙事性成分,细部描写更为丰富细腻,整体结构也往往更为宏阔完整。而这些赋的出现还早于蔡琰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正是在赋体的启发下,自传诗才趋于成熟。而如果视诗赋为同途的话,则中国自传诗体的成熟年代还应再向前推二百年。由板滞的大赋变化为抒情小赋,又由抒情小赋中引出带有自传因素的一个旁枝,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赋所源出的屈骚传统中,使赋的诗性愈来愈增强了。

在唐以前,赋始终是主要的文学创作形式,因而唐以前的自传诗人都不是狭义的诗作者,而是诗赋作家。六朝时期的这类自传体抒情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趋于完美丰富,有的还吸收了大赋的表现手法,篇幅也有加长的趋势。其中重要的作品可以举出潘岳的《西征赋》、《闲居赋》、《怀旧赋》,谢灵运的《山居赋》,庾信的《哀江南赋》、《小园赋》等。庾信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自传体诗赋作家,同时也是对杜甫产生最直接影响的一位诗人。唐以前自传

因素在诗赋中的逐渐增加,到庾信得到一次全面的总结,而杜甫则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继承发扬了庾信的创作成就。境遇相似的身世之感以及传达这种身世之感的自传体文学体裁,将两位作家联系在一起。杜甫在诗歌创作中进一步吸取了赋的营养,同时也使诗基本取代了赋的抒情言志功能,唐以前诗赋分别表现的自传因素到杜甫合而为一,从而发展出更为成熟的、更符合于世界文学的一般文类标准的自传体诗。

二、杜甫自传诗的特征

杜甫在长安初期写作的投赠诗,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已包含了一定的自传成分。但他真正作为自传诗人出现,却应以长安后期写作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为标志。这篇作品也标志着杜甫在思想和创作上的完全成熟。

杜甫诗歌创作的自传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围绕着自己的生活经历而展开的,完整地反映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用清代浦起龙的话说:“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矣。”(《读杜心解·目谱》)

第二,他在人生经历的重要阶段不断写出一些回顾性的长篇作品,详述个人遭遇,剖析揭示思想矛盾和痛苦,并涉及社会环境、时事政治,如《咏怀五百字》、《北征》、《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等。

第三,他在晚年还写作了一些旨在总结描述自己一生的纯粹的自传作品,如《壮游》、《昔游》等。

在上述第一个方面,杜甫还不是一个自觉的有意识的自传诗人,而是由文人作者文学实践的特点决定了其创作的自传性。这

种自传性是中国文人作家普遍具有的,杜甫只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代表。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可以读出他们的人生,而他们的作品也只有与他们的人生经历相对照才能够读懂。由此产生为作家编写年谱和考稽诗歌本事的需要,而中国最早的诗人年谱即是由北宋吕大防为杜甫编纂的。

在第二和第三个方面,杜甫则是一个自觉的自传诗人,运用了真正的自传诗体。其中《壮游》这类作品可能更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自传”,后人也从中挖掘了不少作者的传记资料,以这种形式也可能写出更接近现代意义的自传诗。但就杜甫的创作而言,这类作品与《咏怀五百字》一类作品比较,仅仅是时间跨度较大,并没有像后者那样深入作者的人生。缺少《壮游》,杜甫尚不失其为杜甫;而如果缺少《咏怀五百字》这类作品,则无法想像还会有现在的杜甫。

以《咏怀五百字》、《北征》为代表的这类作品,传统上又称为“记事诗”。它是杜甫的一个创造,直接吸取了自传性辞赋的结构和表现手法^①,将以《悲愤诗》为代表的自传诗体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杜诗的“诗史”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类作品奠定的。尽管这类作品在杜甫手中还仅仅是用来表现人生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全过程,但却最能体现自传和自传诗的的性质,因而值得我们着重分析。

这里首先涉及到自传本身的诗性问题。写作自传动机的产生,绝非近代一般人填写履历的需要。自传不是旁人从纯客观的

^① 参见邓魁英、聂石樵《杜甫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北征》诗注引蔡梦弼、胡光炜诸家之说。

角度描述一个人的经历,而是这个人以对自己的特殊关注来回顾、审视自己的人生。因而,自传应当是情感性的,是最真切的生命体验的回忆。而且在自传中,作者不可能以滑稽的、游戏的态度来对待人生,所表现的往往是他的人生的悲剧因素和悲剧意识。中国第一篇文人自传,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即表现了作者的人生悲剧和源于悲剧意识的“发愤著书”思想,是用诗的笔调写成的,所谓“无韵之《离骚》”。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自传是接受了抒情诗的影响。另一方面,自传又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命运的记录,它必然牵涉到决定个人命运的社会历史环境,必然形成以这个人为中心的放射性结构,通过他的体验反映环绕着他的社会历史环境,从而构成通过自传进入社会、进入历史的可能。在个人与历史结合这一点上,形成了自传的诗性的另一方面。自传诗恰恰是以真正的诗的形式,表现出自传的诗性的这两个方面。杜甫的自传诗(记事诗)则最为真切地展示了诗人情感性的人生体验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他与他的时代、与他生活的世界的诗性关联,也更突出了人生和历史的悲剧的、诗性的因素。

杜甫的记事诗也包含言事和言情两个方面,同时言事又可分为私事、家事与国事两条线索。就叙事因素来说,杜甫记事诗最明显的特征是个人的经历与社会变动两条线索的紧密结合,这两条线索也贯穿了杜甫的全部创作。这一特征已表现在杜甫之前的自传性作品中。它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恰恰是巨大的社会变动造成了诗人的颠沛流离,引发了诗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对自我意识的检讨,因而他不能不从社会角度出发,以全景的方式表现他的时代和他的人生。而另一方面,诗人的个人经历又为历史的文学表现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中心轴。社会历史过程内化为诗人的真切体

验和复杂矛盾的思想过程,从而,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事件记录,而被提升到诗的高度。

这种叙事与叙事诗的区别在于,叙事诗需要完整的(虚拟或不虚拟的)人物、情节,也就是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是用来对对象化的生活世界加以摹拟的;相反,这种叙事是直接记录社会历史事件本身,但却不用将生活世界对象化,不需要另外的故事,而是把事件和生活世界都转化为自己的感受。为与叙事诗的叙事相区别,可以把它称为记事。这种记事因而完全是情感性的、体验性的,外在的历史(时间)过程情感化了,内在化了。即或杜甫偶尔采用“史笔”,如“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之类,也是为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化的需要。而这种情感化的记事之所以可能,即是因为在作品中个人经历与社会变动两条线索紧密结合在一起,言事与言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社会内容进入了诗人的个人生活和情感生活,也就是说,作品的自传性为这种记事提供了可能。在杜诗中,不管社会和个人生活这两条线索、两方面内容是否有某种形式上的照应或包容关系,对个人经历的描述都起到了提供一个完整生动的情感世界、生活世界的作用,使两方面内容统一在情感和体验中。因而,这种叙事(记事)是抒情的叙事。它在记述诗人个人经历时也许是不完整的,即使《壮游》中也留下了许多空白,杜诗编年也绝不会完全落实,但它提供的个人中的世界或世界中的个人这个生活图景却是相当完整的。它的意义绝不在于保存了多少珍贵史料(即如一向因史料价值而为人称道的《草堂》诗,其实其史料性也是相当模糊的),而在于提供了不同于对对象化的世界加以摹仿的叙事诗中的主客分离关系的另一种诗人与世界关系的范例,说明了中国诗人是如何揭示世界的。

就抒情因素来说,杜甫记事诗的最明显特征是感情表现的内向式、自省式,和思考结合在一起,而思考的对象既包括外在的社会方面,也包括内在的精神方面。这一特征在杜甫之前的自传性作品,在嵇康、阮籍、陶渊明、庾信等人的作品中也已经存在。但是在杜甫身上,它更为清楚地表现为一种伦理性的人性自觉过程,生动地展示了杜甫如何从一个普通士子追求功名利禄的思想水平出发,经受了社会现实负面的强烈刺激,在新的层次上重新回到深化了的儒家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上来。因而它具有特殊的伦理意义和审美价值,它所坦露的心灵历程,它所采用的内省方式,正是儒家思想所要求的情感内省和人性自觉的过程。在杜甫对自身情感的展露和剖析中,而不是在对时事的一般评论和对民生疾苦的廉价同情中,最深刻地体现了他的人际关怀精神,体现了儒者的己饥己溺、“不忍人之心”。这是使杜甫得到“真得孟子所存”称誉、在道德意义上亦被称为“诗圣”的原因所在。然而在杜诗中所展现的,又是一个真实的人性自觉的情感主体,而非孟子一系心性论道德观念的简单回应和化身,这又是由诗的形式提供了保证的。杜甫自传诗体的抒情形式与华夏美学的人道精神内在相符,这正是使他成为举世公认的体现儒家人性自觉和人际关怀精神的最杰出诗人的形式上的保证。

因而,这种抒情与纯抒情的区别在于,它既深入到诗人内心深处,又需要通过许多具体的生活事件乃至历史事件来展开,来显露。因而它是叙事的抒情,它与抒情的叙事相得益彰,浑然为一。同时,它既提供了一个人的完整的精神发展过程,又展露了他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层面。在杜甫之前,在文人诗中所表现的神仙、自然、隐遁、任侠等各种思想的某一单纯方面,一般来说并不需要杜

甫自传诗这样复杂的结构来表现,它们与建立一个伦理自觉的情感主体的要求是相悖的。而将一切思想矛盾和复杂成分都过滤净的纯粹的性命修养之谈,也与自传诗的抒情形式根本相悖。因为它缺少一个真实的情感主体,只剩下一些碎裂的伦理概念,无法撑起人的自传这一宏伟结构。而杜甫既提供了一个真实生动、完全情感化的儒家思想人格的典范,同时也提供了表现这种人格的独有方式——自传诗。

杜甫记事诗的两篇代表作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恰好提供了两种不同类型,说明了上述特征。《咏怀五百字》侧重于内在精神过程的描述,其中尽管也包含了个人(家庭)遭遇与现实社会状况两条线索,但社会情况主要是作为一种反面的刺激,推进诗人思想矛盾的展开和情感的升华。按照传统划分的三大段落,针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批判恰好被放在此诗的中间一段,在它之前描写了诗人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和自我反思,在它之后则描写了诗人的情感升华和人性自觉的过程。因而这首诗主要采用了叙事的抒情的结构,纷至沓来的社会事件、个人挫折、家庭不幸,均成为影响诗人精神发展的因素,由外而来的刺激和由内而发的冲动决定了全诗的格局,而使诗人精神人格的成长挺立得以呈现。《北征》一诗则基本以叙事贯穿始终,其中也包括向外的对政治问题的直接评论。但在叙事中却始终双管齐下,一边描写探家的过程,一边描写国事的动荡,两条线索“若有照应,若无照应,若有穿插,若无穿插,不可捉摸”(王嗣奭《杜臆》)。然而,这看来没有紧密联系的两条线索,在将外在历史过程情感化的杜诗深层内涵上却是不可分割的,全诗因而统一在一个真实的情感世界和体验过程中,此诗的叙事便成为一种抒情的叙事。这些特点实际体现

在杜甫的大多数作品中,因而在杜诗中很少能看到纯抒情的作品,他也绝不能被片面标榜为所谓“写实诗人”。总而言之,用抒情、写实、浪漫、象征等等其他概念,都难以切合杜甫作为诗人的总的特点,唯有称他为自传诗人才最能凸显他的总体特征,也最确切地说明了他在中国传统诗歌中的代表性。

三、杜甫与西方自传诗人的比较

无论就历史发展阶段的相对近似而言,还是就对道德观念和形式规范的强调而言,杜甫所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都似乎与浪漫主义之前的西方古典诗歌传统更为接近。但直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前,西方诗歌中所缺少的恰恰是杜甫这样的自传诗人和他的自传诗体。中西诗歌传统的差异,在这一点上显示得相当清楚。

自传诗在西方的缺失并不是偶然的。古希腊以来的诗学观念将诗称为“摹本的摹本”,诗人被当作处于从属地位的、工具式的摹仿者,与被摹仿的现实世界或理式世界相比,是无足轻重的。诗人本人的经历当然不可能成为诗的内容,诗人的主体意识也必然遭到压抑。同时,古典主义恪守袭用传统题材的信条,诗人创作的题材大多取自《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的史诗、悲剧。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时期的诗人如果要表现现实题材,也往往要把它们转化为宗教题材或历史题材,只能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观感。可以说,西方传统的诗学观念和对诗人角色的认识,均不适宜于自传诗的产生。而这些诗学观念又与西方叙事诗传统的发达、抒情诗传统的相对薄弱,有着内在关联。而且如前面已指出的,自传诗